

良渚文化考古研究的先行者施昕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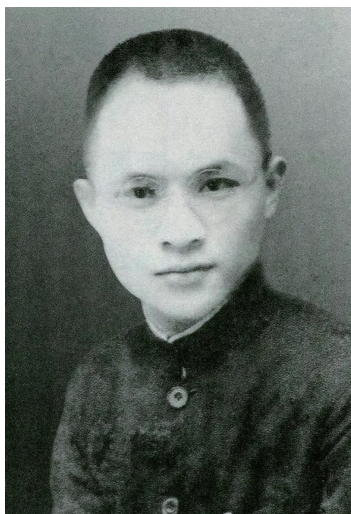
学生时代

施昕更出生在杭县（今余杭县）良渚镇。他父亲施甫才，在镇上开茶店。施昕更7岁时进入镇上的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成绩突出。小学毕业后，他父母借了学费，到杭州上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系半工半读。该班分金工、文工2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文工组，专攻绘图；除正课外，他还兼习国画和西洋画。该校系由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育。

供职博物馆

1929年6月，杭州举行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施昕更经老师介绍，在博览会的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博物馆陈列着许多历史文物和矿物标本，施昕更得以大开眼界。在馆内任职的时间虽不到半年，但对他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研究兴趣却影响很大。博览会结束后回良渚，到第二年浙江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博物馆原有的那些陈列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靠着旧有的关系，得以重返该馆工作。

该馆分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两部，自然科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3组，施昕更



施昕更

1912~1939年

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时年仅20多岁。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时是杭州西湖博物馆的一个职员。

以其绘图所长，在地质矿产组任绘图员。

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纪怀（陈布雷之兄），地质矿产组主任盛莘夫（五十年代后任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古生物研究室主任），都是饱学之士，施昕更在这两位前辈的熏沐和指导下，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而且在地质矿产专业知识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地质矿产组助理员。1933年，他作为一名助手，随盛莘夫去孝丰地质考察，爬山越岭，辛劳备尝。施昕更还常把考察所得撰文在本省报刊上发表。

1935年，他写就《浙江地质矿产志》一稿，惜未发表。这一年，他还代表西湖博物馆去天津参加全国地质会议。



初作考古调查

1936年，西湖博物馆对杭州古荡的一处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施昕更也被派往参加。发掘中出土了一件有孔石斧，这引起了施昕更的密切注意。因为这种有孔石斧在良渚也曾出现过，而且为数不少。施昕更决意回良渚去考察调查。

良渚以及与它相毗邻的安溪、长命等乡，有不少古文化遗址，农民在翻耕土地时常会发现一些地下文物，最常见的有陶器、石器和玉器。玉器是一种珍贵的东西，常有一些古董商人前来高价收买，人们看到有利可图，竞相盗掘。但他们只要玉器或是可以换取现钱的别的文物，见到陶器和石器却是丢弃，所以在一些盗掘现场往往可以捡到随地丢弃的陶器和石器，被损毁了的大小碎片更是俯拾皆是。

施昕更回到良渚。见到曾被盗掘过的那些遗坑都已被土地的主人填平，种上了农作物，不但找不到石器，连遗坑的位置也难以寻觅了。施昕更并不灰心，他走村串户去访

问了一些老人，搜集到不少口头资料，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大体分布状况。从盗掘者那里了解到他们把“文化层”称为“做土”（“做”是指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经过人工翻动之意），还了解到他们把某些陶器和石器当作挖掘玉器的线索，称之为“猜”，按其形状谓之锄头猜、喇叭猜、枕头猜、箭头猜……施昕更把那些口头资料加以分析。那时他趁机向农民宣传地下文物的考古价值，强调必须加以保护。有一次，他从一个农民那里买来一面铜镜，他父母埋怨他，他说：“我如果不买，他就会去卖给古董商人，几经辗转，说不定还会落到外国人手里。”

同年7月，他再次回良渚，终于捡到了几件粗糙的石器。有了收获之后，他马上给自己提出了研究课题：

石器和玉器究有何种内在联系？

有石器和玉器发现的地方到底是古人的生活区还是墓葬区？

要想探究这种历史现象和解答这种科学难题，仅凭两件实物资料显然是不够的，所

芳草地

以他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资料。于是在这一次调查以后不久，又回良渚做再一次的调查。

11月3日，他在良渚附近的棋盘坟的一个池塘里（因农民戽水灌田，池水已干），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开始他以为可能是乌髫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髫出名。带到杭州同别的陶片进行比较，复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由于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这引起了他的莫大兴趣，经过进一步考察，果然有许多类同之处，据此，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在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的注意力就从石器转移到黑陶上来。

他把黑陶的初步调查和发现公之于众以后，当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那时候博物馆已由董聿茂继王念之后担任馆长。董聿茂虽然是一位生物学家，但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也旁及到考古学，对考古工作也很重视，所以对施昕更的考古调查慰勉有加，在肯定了棋盘坟遗址的价值以后，立即依据那时的《古物保存法》，由博物馆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良渚进行田野发掘。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一个特大喜讯，他一得知这一期望获得了实现，不禁为之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他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见他这副情状，直把他当成疯癫了。

发掘良渚黑陶

田野发掘工作分3次进行：

第一次在1936年12月1日至10日；

第二次在同年12月26日至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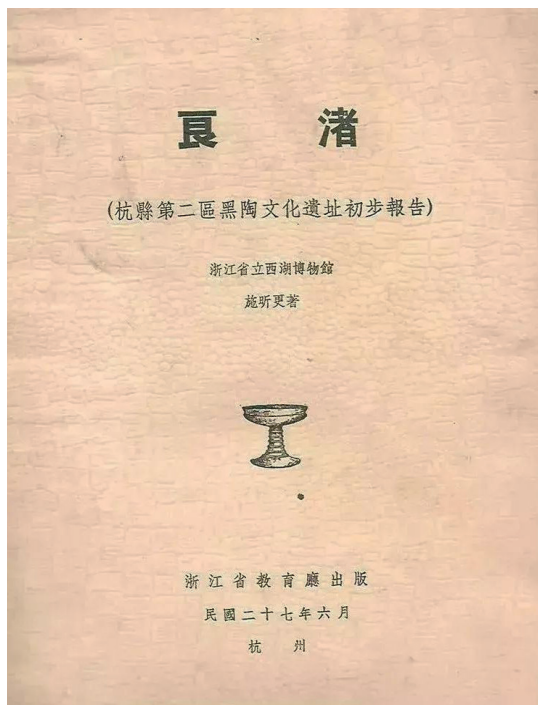
第三次在1937年3月8日至20日。

第一次发掘的地点是捡到过黑陶碎片的棋盘坟，由施昕更主负其责。他们利用池水枯竭的池塘深度，在池底向下挖掘，挖掘时虽然因土湿而工作相当困难，但仍有不少收获，除发现很多陶豆柄、皿圈足和碎片以外，还发现实用石锤和石刀各1件。

第二次发掘仍旧在棋盘坟原地进行，仍由施昕更主其事。这次发掘收获比前一次大，所发现的黑陶器物数量多，种类也不少，除陶豆柄和圈足以外，还有较完整的陶甗、陶壶和陶豆。为了力求确认无误，施昕更还请了馆长和历史文化部主任到现场实地观察。

连续两次发掘的收获使施昕更提高了认识，也增强了工作信心，第三次他就扩大了发掘范围，除棋盘坟以外，还发掘了就近的好几个地方，而且还扩及到安溪、长命、大陆几个邻乡，一共有12个遗址。

这12个遗址是：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



朱村斗、荀山前后、许家斗、近山前东、横村塘、大雄、钟家村、金家弄、后河村。这次发掘获得较完整的巨大陶鼎、陶壶、陶皿、陶甗、陶簋等 10 余件，碎片 500 余件。

12 个遗址当中，有黑陶出土的 6 个，有石器出土的 6 个，曾经出土过玉器的有 7 个，多数遗址是几种遗物均有发现。

玉器向以安溪乡出土的为最多，因此，附近各乡镇（包括良渚）所出的玉器历来通称为“安溪土”玉器，这一分布状况施昕更是知道的，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起见，特别是由于黑陶是他研究的对象，所以发掘地点大都在良渚荀山附近，对安溪乡的遗址只发掘后河村一处（安溪乡现有良渚文化遗址 10 余处，长命乡也有好多处）。

发掘告一段落后，因为觉得发现良渚黑陶的意义重大，特邀请那时的考古学权威董作宾和梁思永前来实地察看，并获得了认可。

当进行发掘时，常有一些人前来捣乱，恣意破坏，为了顺利工作，施昕更只好请求政府派员看守，但仍无济于事。又有当地村民误以为施昕更的目的是想盗掘玉器，牟取暴利，故群起反对。关于这种情况，施昕更曾在报告中记载说：

“当地一般无知农民不明是非，横加阻难，或以为我个人借此自肥；又其中莠民三四人合股于夜中盗掘，被毁农田极多，而皆归罪于我，几成众矢之的。”

在战火中成书

施昕更把所有出土的遗物经过整理，接着动手撰写调查报告。虽然所掌握的资料不足，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战云密布，时不我待，他只好仓促成书了。

他把调查报告写成五章，这五章是：绪言、遗址、地层、遗物、结论。在“遗物”这一章下面又分四节，这四节是：黑陶、印纹陶片及素面陶片、石器、其他。在“黑陶”这一节下面又分为四目，这四目是：比较、范式、结构、形制。显而易见，施昕更对黑陶的叙述特详，对玉器却只在“其他”这一节里略有道及。

调查报告共计 5 万字，除正文外，附图 100 余张。仿照《城子崖》定名为《良渚》，副题是《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脱稿后在杭州付印，不料抗日战争爆发，随着上海与南京的相继沦陷，杭州已处在一日数惊当中，因而印刷被迫中断，施昕更只好把校样寄放在良渚乡下一亲戚家中（后来因受潮发霉，无人管理而全部损毁），自己携原稿赶返已经撤离杭州的博物馆，与同事们一起向浙南转移。先从富阳到兰溪，再到永康，后又迁往松阳。在流亡途中奉馆长董聿茂之命，复将《良渚》原稿进行整理，时写时辍，迭经困顿，最后才得以完成。此时博物馆经费日渐短少，只好缩小编制，至永康时人员裁减到只剩 5 人，经费只剩旧币 300 元，印刷《良渚》一书已为财力所不许。至松阳，旧币贬值，物价猛涨，境况更加恶劣，博物馆终于被迫解散。《良渚》一稿则由董聿茂携往丽水向迁到那里的浙江省教育厅呼吁，请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获准后，复因内地印刷厂设备不完全，无法印刷，只好派馆员钟国仪携稿赴“孤岛”上海，在中国科学公司付印，并委托寓居在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助校对，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问世。

芳草地

客逝瑞安

博物馆解散后，施昕更经董聿茂介绍，去瑞安县自卫会担任秘书。到任不久，忽患猩红热并发腹膜炎；曾赴永嘉就医，途中适遇敌机轰炸，身受颠顾，致使病况益发加重。战时缺医少药，在艰难的处境中终至于不治，于1939年5月29日病逝于瑞安县立医院，年仅28岁。遗有一妻一子（子仅8岁）。那时余杭早就沦陷，施昕更的家乡已被日寇设营驻守，寡妻孤儿生活苦不堪言。

施昕更一生为人正直诚恳，好学不倦，笔者曾听到董聿茂馆长评价他说：“施昕更工作很努力，是一个好青年。”有人在《瑞安日报》上撰文悼念他说：“真料不到，一个有为的青年在抗战最严重、国家民族最需要他的时候，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考古学上的影响

施昕更运用考古学研究历史，以发掘遗址为方法，以实物资料为论据，单就这一工作本身来说，在那时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了。至于他对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所获得的大量遗物，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那意义就更大了。

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一直以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夏、商、周时期还是很落后的化外之地，远落在中原地区之后，可是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黑陶以后，人们就知道那种记载有背于历史实际了。良渚黑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就有相当发达的文化了。虽然限于历史条件，那时施昕更认为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文化的一支，是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而目前却已为独立演化说所更改：然而在事实上，当年施昕更提出传播

一说也不是决断性的，而是假设性的。若从字面上来说，不提传播，但南、北文化在长期演化中的相互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施昕更在《良渚》一文里关于这一论点是这样写的：

“…浙江的黑陶或许是较晚于山东，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区域文化沟通发展及民族迁徙繁衍之痕迹，浙江黑陶文化可说是在这种情形下面是传播关系而产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属同一系统产物外，究还有若干的异质成分，当为吴越民族所遗留，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

施昕更这段论述在那时使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就是在现在也还不失其参考价值。

关于科学研究，只要掌握到充分的资料，问题总会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五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继承着施昕更未竟的事业，在余杭县内外和浙江省内外进行田野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收获。

举其要者，如：为良渚文化内涵提供了认识基础的1956年吴兴钱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选压关系、太湖流域古文化最典型序列的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敛葬的1982年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高台土墩良渚文化大墓的1983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随葬大量琮、钺、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的余杭反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良渚文化墓葬与祭坛复合的余杭瑶山遗址的发掘。其他规模较小的发掘更是不可胜数。

可以想见，在科学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下，今后的考古发掘一定会进行得更好，收获更大。

（本文来源：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